

三国文化及其应用研究

谭良啸

摘要:近年来对三国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国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本文对其大致情况作了概要介绍,认为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的大量出现,顺应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关键词:三国文化 应用研究 专著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1)05-0010-05

三国文化这一概念正式提出已近十年,对其认识至今仍有分歧。三国谋略运用的历史上千年,而有的人则不甚了解,动辄称海外某国应用得如何如何。近十几年来,我国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如火如荼,出版专著达五、六十部,其类别、写法、特色、不足之处均应加以总结。本文对上述三方面问题作了概要介绍,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以供同仁研究参考。

—

关于三国文化这一概念,是1991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首次“三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提出来的。在会后的综述和有关文章中,我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三国文化,是以三国历史为源,《三国演义》为主流,以及由它们衍生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称。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学概念。它融史学、文学、戏曲、艺术、文物古迹、现代影视等多学科和多种文化形式为一体,不仅内涵十分丰富,而且源远流长,有着深广的影响和巨大的魅力。”^[1]

三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提出后,不少学者也发表见解,有的阐述得更详尽,有的则有不同的认识。

胡世厚先生在《三国文化概览》一书的“前言”中说:“所谓三国文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文化;一是指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作品问世后在中国人民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三国文化概览》所说的三国文化是指前者,即魏、蜀、吴三国鼎立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2]

龙显昭等先生在《三国文化 历史走向》一书中没有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作具体陈述。他们在“前言”中说:“本书对三国文化及其历史走向的探讨,侧重阐述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或价值观的主要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什么时代的什么人呢?“三国英雄、智囊

和名士在政治竞争角逐时代,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富于特色的人谋文化。”那么,该书探讨的也是三国历史时期的文化。^[3]

沈伯俊先生在《三国漫话》一书的“结语”中说: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第一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就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现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他认为,广义的‘三国文化’观,较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4]

杨建文先生在《三国演义新论》一书中的“前言”里则认为,运用“三国演义文化”这一概念更为妥帖。他分析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民族文化包容量极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其文化蕴涵量十分丰富,又相当复杂。三国历史故事成书经评改,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汉魏时代铸就的三国时代文化心态的外化,又是汉魏以后历代世人对由这外化所构成的“三国文化”的主动接受和阐释;其包容量与涵盖面,不仅丰厚于“三国文化”的历史积淀,而超过了《三国演义》本体的文化蕴涵,因此可称它为“三国演义文化”。他指出,“三国演义文化”有它产生、形成、发展的无止境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原型三国演义文化阶段(三国时期);前导三国演义文化阶段(两晋至宋元时期);本体三国演义文化阶段(元末至明中

叶);后续三国演义文化阶段(明中叶至今及未来)。这四个阶段反映了‘三国演义文化’由积淀与生成,经丰富与发展,至结晶与升华,到流变与拓新的历史过程、文化内涵和迁流走向。”^[6]的确,《三国演义》在三国文化中占有十分主要的地位,但把它前伸后延,覆盖三国历史和今天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则难以服人。因此,杨先生的见解没有流行,多年来人们仍习惯用广义的“三国文化”这一概念。例如,1993年5月,在浙江富阳召开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上,就是采用的广义的“三国文化”这一概念,与会的有三国史研究专家、《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以及从事三国题材创作或表演的艺术家。

在三国文化这一概念提出后,学术界又提出了诸葛亮文化现象、关公文化现象等。不少学者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化现象作为“三国文化”分支,置于广义的“三国文化”的框架之中。

由于文化学对“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使得“文化”这个概念有歧义性和非确定性,一般可作广义和狭义的理解。而广义的文化可从结构和层面上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因此,对三国文化的了解存在着歧义,便属正常。如前所述,本文所采用的“三国文化”概念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化。那么,它发生、发展、形成和日臻完善的过程,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它的运用,也是融入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

二

关于三国文化的运用,我是这样认识的。三国文化在它发展、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很多三国文化现象,既是三国文化的载体,成为其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三国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的应用形式。因为一种三国文化现象在某个时期出现,是那个时期人们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它出现后流行于那个时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或经济效益,就是有了实用价值。例如,宋代讲史艺人的“说三分”,元代戏曲中的“三国戏”,元末明初的小说《三国演义》等,它们都是新时期的三国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三国历史故事在新环境中的应用,并对当时的人们产生影响。今天的三国题材影视剧,三国人物和故事的旅游工艺品,也是三国文化载体和应用合二为一的形式,也是应社会之需产生的,并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影响。因此,正是过去各个时期的这些三国文化现象载体和应用合二为一的

形式,象一个个相扣的环练,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特色独具、魅力巨大的三国文化。

三国文化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其构成的支系统和层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作深入的专题研究。因不是本文阐述的内容,不赘述。三国文化在形成的漫长历程中,积淀着晋唐以来各类人们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这是它在形式上和内涵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过去,人们对三国文化的运用有主动和被动、自觉和不自觉之分,而主动和自觉地运用三国文化最多的,大概也是其中的忠义道德观和丰富的斗争谋略。关于这方面的事例也最多。

清人刘銮的《五石瓠》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清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为尤多。”

清代前期,统治者运用三国谋略最为典型。“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6]魏源在《圣武记》中说:“顺治七年,翻译《三国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程等赏靴马银币。又闻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战辄陷阵。海公曰:‘尔将才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译《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荡平三省教匪。是国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且罗贯中大半引申于陈寿,非尽凿空;故朝廷开局,译为官书,以资教胄。”

关于三国文化的谋略在明清时代的运用,近人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他说:“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侈运用之才,动言‘诸葛’。此犹影响之小焉者也。太宗之克袁崇焕,即公瑾赚蒋干之故智。海兰察目不知书,而所向无敌,动合兵法,而自言得力于译本《三国演义》。左良玉之举兵南下,则柳麻子授衣带诏故事怱怱成之也。李定国与孙可望,同为张献忠义子,其初脍肝越货,所过皆屠戮,与可望无殊焉。说书人金光,以《三国演义》中诸葛、关、张之忠义相激动,遂幡然束身归明,尽忠永历,力与可望抗,累建殊勋,使兴朝连殒名王,屡催劲旅,日落虞渊,鲁戈独奋,为明代三百年忠臣功臣之殿,即与瞿、何二公鼎峙,亦无愧色,不可谓非演义之力焉。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

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则此书不特为紫阳《纲目》张一帜,且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

黄文中提及的人物,太宗即清朝创立者皇太极,海兰察是清朝的大将,袁崇焕、左良玉为明末大将,张献忠、李自成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格尔、洪秀全是清代的造反领袖,李定国初为造反头目,后归顺明朝。如此众多人物的生动事例说明,三四百年前,三国谋略已被广泛运用,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三国文化中忠义伦理观较典型的形式是“桃园结义”。结义故事最早出现于宋代话本,经元代戏曲而完善。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历史原因。宋代时商业繁荣,城市发达,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市民阶级空前壮大。只身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在闯荡江湖中深感朋友相助的必要。当时虽有行会,然而等级森严,他们渴望有亲如兄弟的朋友。话本和杂剧,是当时为适应市民情趣,表达市民情感而兴起的文艺形式。市民反感社会上的不平等,渴求行侠仗义的朋友,希望人人亲如兄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关、张三个出身贫寒的市民,在报国安民、打江山中“恩若兄弟”的史实,经艺术加工成了“桃园结义”的故事。从此,结义故事便成为体现三国文化忠义道德观的一种形式,很快就为社会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面引文所说到的,社会上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刘关张结义后“名为君臣,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祸福与共的忠义成为了人们的楷模,后人纷纷仿效。以结义的形式相互帮助,谋生计,闯江湖,图发展。

不仅下层社会的平民用结义的形式,团结互助,上层社会因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使用“结义”手段。据清代《缺名笔记》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始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7]努尔哈赤为了控制蒙古人,使之忠心归附,以便自己放手南下,运用了“结义”的形式。据说,蒋介石也曾采用金兰结义的形式,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换帖,结为兄弟,以笼络地方军阀。

在海外华人中,三国文化忠义道德观的应用更为突出。近一两百年来,华人漂泊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为求生存,求发展,相互间更需要真诚团结和救助。“桃园结义”和“古城会”所体现的刘、关、张、赵四人的忠义仁勇、讲义气和重情谊的精神,成了他们追求和向往的样板。于是,他们仿效三国故事,成立“刘关张赵古城会”、“古城会馆”、“刘氏宗亲会”、“关氏公会”、“赵氏公会”、“龙岗亲义会”等社团,联络同姓侨胞,“本着四贤(即刘关张赵)忠义仁勇的精神,讲义气,重情谊,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共图兴盛”。^[8]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类华人社团有140多个,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已有上百年历史;参加人数多达300多万,为海外华人总数的七分之一。^[9]可以说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国家 and 地区,就有这类“三国”社团组织。

三

三国文化广泛应用于各个历史时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的很多表现形式和现象,是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产生后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被人们所应用。如关公文化现象,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被人们所应用的事例至今随处可见。不过,历史上各时期对三国文化的应用,还没有进入应用研究这一领域。

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用研究,是一个与纯学术研究或称本体研究相区别的概念。应用研究的目的和成果,都着眼于应用,服务于当前。我国关于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是十几年前才开始的。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三国文化本身又提供了很多可借鉴、可利用的东西,于是,不少学者纷纷从新的视角,或开会探讨,或撰文著书,就三国文化与领导艺术、与企业管理、与识人用人,与现代商战、与为人处世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中提出很多可供今人借鉴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大量引证举例,以古今中外军事和经济斗争中成功或失败的事件来评说印证,希望人们获得启迪受到教益。

关于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开过如下几次。

1986年12月4~7日,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在广州召开了“传统文化与现管理研讨会”。这是首次从应用角度研究《三国演义》的专题讨论会,会议就在现代企业、单位管理中,如何借鉴应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中的智慧和谋略进行了研讨。

1988年5月19~24日,在海口市召开的

“全国第五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关于《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正式列为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这说明,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已受到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5月4~8日,在合肥召开了“三国谋略与现代商战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华工商时报社、合肥星光形象设计中心等单位主办。主办者提出的主题十分明确,即:“探讨三国谋略,服务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推动经济发展”;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这次研讨会,推动《三国演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闪烁着历史智慧和古代文明的三国谋略,与现代经济密切结合,发挥其指导、策划的借鉴作用。”这是一次关于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尽管规模不大,但充分显示了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勃勃活力。

关于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论著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收集较难,本文仅就专著加以评介。

武侯祠博物馆资料室和我手边收存的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共有50多部。当然这是不完全的统计数。第一部出版于1986年,最后几部是今年出版的,时间跨度有16年。粗略地浏览这些专著,可发现有如下特点。在这50多部专著中,以《三国演义》为研究对象的居多,约占五分之四。而从三国史角度研究的则较少;以剖析、研究“三国”谋略、智慧的居多,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谈论其它方面问题的则显得少。多数专著都附有作者简介或在“前言”、“后记”中介绍了作者的情况,由此我们得知,这些专著有的是由三国文化研究家编著的,有的则不是由三国文化学者所撰,有的则为三国文化研究者与企业家合著而成,作者的身份呈现多样性,且多数不是从事三国文化的研究者。这是从书目和作者就可以看出的目前三国文化应用研究存在的现象和特色。

从内容看,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在写法上主要可分三类。一是提取“三国”谋略,加以分析并引证;二是提取三国历史经验、教训,加以分析并引证;三是改变三国人物传记的写法,在阐述诸葛亮、曹操等人的生平或分析其事迹时,提取经验、教训,为今人服务。下面分类介绍几本有关专著,以窥一斑。

剖析谋略类。《说三国 话权谋》一书是目前最早出版的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该书初版后多次重印,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全书由113篇各自独立的短文组成。作者在“前言”中

说:每篇“抓住《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一个个斗智斗谋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分别进行了具体的评说”。文章均“采取札记、随笔、纵横谈兵的形式,从研究谋略故事着手,事理结合,夹叙夹议,力求给读者思维上的一些启迪”。其篇名如:“张飞的反伏击作战”、“蒋干盗书与反间计”等。“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出版也较早,有“战略篇”、“较量篇”、“伐交篇”、“人才篇”、“素质篇”等5篇,共35章。每章都有副标题,有的章下还有小节。如34章,“好谋无断酿悲剧——高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决断能力”,内容是先讲《三国演义》中的有关故事,然后引证中外企业家决断成功的例子。

总结历史经验类。例如《三国用人艺术》一书,由74篇短文组成,每篇文章两千多字,多数文章后附有资料引自《三国志》某传。作者在“后记”中说:“三国创立者的用人和三国人才作用发挥的历史事实,对我们今天,实有可借鉴的意义。”“序”中称,该书“专门而又系统地三国史料中挖掘出某些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材料,结合现实用人上的利弊得失,一事一议,有的放矢地发表见解”。篇名如“博大的胸怀 恢宏的气度——谈曹操用人”、“哭刘封说内耗”等,都是先述史实、故事,而后发表议论。《三国兴衰谈》一书,5章73节,章名为“君臣友谊篇”、“君臣组合篇”、“谋臣人才篇”、“谋臣决策篇”、“谋臣纳谏篇”等。作者在“概论”中称,该书“主要依据历史典籍,另辟蹊径,从三国君臣关系探寻三国的兴衰”;目的是“探讨三国文化的思想结晶,论述三国时谋臣、将相和君主的相互关系、作用,从而概括他们事业成功的历史经验”。如“谋臣决策篇”一章,有“决策的时间、时机观”、“审时度势灵活决策”、“决策与思维随笔”等小节。该书议论夹于叙事之中,评论少,无引论。

关于人物传记写法的改变,可分三种形式。一种仍按传统的人物生平事迹时序,形成章节,在每章节讲述人物事迹的同时,加以评论或引证说明,以古鉴今。第二种则不按人物的生平时序,而是根据全书主题的需要来安排人物的事迹和故事,形成章节,加以点评和旁征博引,给人以更深刻的理性认识。第三种可以说是人物传记的“另类”。它不写人物的生平,只从其事迹中提取人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达到更好地发挥三国文化应用功能的目的。

第一种人物传记有《制胜必鉴》、《卧龙辅霸》等书。第二种有《曹操枭雄人生》、《诸葛亮

智圣人生》等书。如《智圣人生》一书共9章,第一章“高瞻远瞩 逐鹿中原”,共10节,从隆中对策到北伐中原,概述诸葛亮的一生,余下8章则从各方面阐述诸葛亮的品格、修养、能力、智慧、业绩及成功奥秘,并不时加以评点。第三种形式的书有《曹操争霸的九九方略》、《变脸高手:曹操的争霸学》、《谋略高手:诸葛亮的驭心经》、《厚黑高手:刘备的登龙术》等。如《谋略高手》一书共四篇81小节。篇名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诸葛亮的军事韬略与现代领导决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诸葛亮的为政之道,为官者鉴”、“慧眼冰鉴 广纳博容——诸葛亮的识人、用人之法与现代商战”、“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诸葛亮的品性修养与人格魅力”。每篇前有提要,每小节开始有诸葛亮故事介绍,然后是评论、引证等。

近十几年的三国文化应用专著数量多,类别齐全,写法丰富,是前有未有的。这一大批专著,把三国文化的应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三国文化在当前的一大特色。

四

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在近十几年里大量出现,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是新时代人们的要求。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逐步转入市场经济,现代领导艺术、经营管理科学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人才争夺,都十分激烈。商场如战场,商战即战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就需要行政领导、企业家、商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转变观念;同时,现代商战也给人们提供了展示才干、体现自我的机会和舞台。于是,人们开始一方面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方法、技巧和经验,武装自己;一方面把眼光投向历史,从中吸取制胜的经验教训。三国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为今天身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人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需要和可能的结合,三国文化应用专著便应运而生。

很多三国文化应用专著都明确表示是应时代之需,以助人成功为宗旨。《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的“序”说:“由于经济领域里的竞争与军事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的共通性,身处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特别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完全可以从《三国演义》中汲取智慧的营养,借用谋略的武器,启迪制胜的思路。”《为人处世与〈三国演义〉》一书的“前言”说:“看三国之要领盖在于此:看别人为人处世,找自己人生准则。这便是此书的宗旨。”《谋略高手——诸葛亮的驭心

经》一书在封底上写着:“本书的宗旨是:带给你急需的人生智慧,助你在人生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熟读本书,叱咤风云,摘星揽月,并非遥不可及;智谋在手,走遍神州。”《三国智慧今用》一书在封底印有赫然几个大字,称该书是“做人、处世、创业的实用成功学”。

三国文化应用研究专著从经营谋略、经营管理、市场竞争、人才竞争、现代公关、策划决策、领导艺术、用人艺术、为人处世、人才成功等方面多角度地把三国文化中那些对今天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用的东西挑选出来,加以整理和系统化,赋予新的释义,使研究贴近现实,服务于身处经济大潮中的领导干部、企业家、商家和各行各业的人们,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尽管,目前还没有看到因应用三国文化精华而成功的人士涌现出来,但它的潜移默化作用则是长远的,三国文化在不少领域或地方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则是有目共睹的。

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方兴未艾,形势喜人,但也存在某些不足。从出版的专著看,有的不够严谨,如评论人物时将史书资料与小说虚构情节混为一谈;有的科学性不足,如将诸葛亮出生地、赤壁之战发生地的今地误注;有的在分析举例中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如把“欲擒故纵”用于教人故作姿态以换取姑娘欢心等。当然,三国文化应用研究的主流是好的。

新时期的人们有着新的需求,这为三国文化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如何使研究更好地贴近社会现实,以有价值的成果,为经济发展、个人成才服务,仍然是我们三国文化研究者需要努力去做的一项工作。

注 释:

[1]谭良嘯:《三国文化古今谈·前言》,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2]胡世厚:《三国文化概论·序言》,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3]龙显昭、李纯蛟、蔡东洲:《三国文化 历史走向·前言》,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4]沈伯俊:《三国漫话·“三国文化”概念初探(结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5]杨建文:《三国演义新论·〈三国演义〉论坛一瞥(代前言)》,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6][清]王嵩儒:《掌故零拾》卷一《译书》。

[7]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

[8]谭良嘯:《海外最大的“三国”社团——龙岗亲义会》,载《成都侨务》1996年第1期。

[9]谭良嘯:《略谈海外的三国文化应用及其研究》,载《成都文物》1996年第4期。